

牛年说牛

蚌埠 韩国光

兼辟瘟疫

池州 赵柒斤

2021年喜逢牛年,说牛写牛又成了众人的话题。牛,一生脚踏实地,劳累终生,且不图回报。数千年来留下了不知多少蹄迹足痕,深深印入了人们的心灵。牛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是人类最值得信任的朋友。崇牛、颂牛、奉牛为神是古代先民们善良的习惯信仰,实际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。中国几千年不变的封建农耕制社会,人与牛结下了不解情缘。

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,人类开始使用了陶器和铸造的青铜器物件,并且出现了不同变形的动物或植物的具像图形,其中就有牛的具像图形。至殷周,牛的青铜铸件成了高贵的祭祀神物,春秋战国统治者的战旗,都挂有牦牛尾,以鼓舞士气和祈求胜利。在诸侯会盟时,盟主都要“执牛耳”取血,与盟友共饮,共订盟约,以体现立盟定约的至高无上。到了秦汉,青铜铸造技艺更为精致,钟鼎、铜鼓或墓葬物都不乏有着牛头纹或威武雄姿的牛像。据资料记载,我国出土发现的有关牛的文物真是不少:有新石器安徽望江遗址出土的陶牛首,辽宁东沟县后洼遗址出土的石雕牛头,有陕西洋县出土的商代铜牛觥,牛的造型生动,纹饰也精美绝伦。太原出土的北齐陶牛,体格雄健,牛头高昂,脖颈坚挺,犄角冲天,佩戴有络头、璎珞、和杏叶等。陶牛的四肢有力地叉开,支撑着强壮的躯体,雄态威猛。匠师制作陶牛,除了卓越的造型能力,还显然得益于对牛的细致观察。还有西周中期陕西岐山县贺家村出土的铜牛尊,汉代宁夏出土的夹牛,东汉墓甘肅武威出土的水牛,以及河南偃师李家村出土的鎏金铜牛,等等,多的也无法一一统计。

在我国文化典籍中,牛有着极高的象征意义,所以,历朝历代才会出现如此众多的关于牛的一些杰作。唐代黄河古道的铁牛,除了有着固定当年的蒲津铁索浮桥的作用,还有一种作用就是,祈求对当时泛滥的黄河水有所震慑。《易经》上说,“牛象坤,坤为土,土胜水”。古人认为牛拥有“五行”中土属性和水属性。五行中讲水能生木,牛的耕作能促进农作物生长,又讲土能克水,故此,古人们常设置铜牛、铁牛以镇水魔。这铸铁牛置于黄河河岸,也想寄寓它能征服水患,求得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。在中国几千年历史进程中,牛又一直都是劳动人民勤勤恳恳的象征。牛吃进去的是草,挤出来的是奶,劳作时任劳任怨,收获时也不要求主人给予更多赏赐。我国长期以来都处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时代,而农耕文明时代标志性的劳动力之一就是耕牛。

我在中学时代就知道一些颂扬赞美牛的诗篇。这样的诗,从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至清代的诗,都能找到。《诗经·王风·君子于役》中写道“日至西矣,养牛

下来……日至西矣,养牛下括”,就是颇有意境的与牛相关的写景名句,它让我们看到了农村傍晚的景色。较全面写牛的形象与活动情形的,我们还可以看《诗经,小雅,无羊》,其中这样写道:“谁谓尔无羊,三百为群。谁谓尔无羊,九十其犒。……尔牛来思,其耳湿湿。或降于阿,或饮其池,或寝或讹。……”

这首诗生动描绘了牛的生活、饮食、住处、交配等方面,也是今天能看到的最早一首对牛具体描写的诗。熟悉牛的人都知道,牛没有骡马暴躁,没有驴倔强,是农村老人、儿童、妇女皆可放牧役使的大家畜。这充分反映了牛的性情温良,古诗中多次写到牛温顺的性情,牛不欺老幼,从袁枚的《骑牛》诗歌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,“相牛之背笑不休,此是人间安稳处。七十老翁有所求,呼僮扶上不拖空。牛亦相怜身不动,鞭之不前徐徐。”这是牛驮着七十老翁袁枚行动时的情形,人骑上牛时牛“身不动”,走时还“行徐徐”,真是颇有人性,怕伤着老人啊!牛还能与弱小的动物和睦相处,唐代陆龟蒙的《放牛》诗便有这样的诗句:“牛蹄行于牛尾摇,背上闲闲立春鸟。”牛如此庞然大物,竟允许小鸟在它背上歇息,这是何等的温良、宽容和友爱?

我喜欢咏牛的诗歌也爱古代名家创作的牛画,去年我在书画院学习时,老师就让学员买了不少经典名作画集。老师说,唐宋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巅峰时期,涌现了很多艺术史上极具影响力的画家和作品。唐代最具特点的主要有三幅作品:《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》《五牛图》《斗牛图》。其中的《五牛图》《斗牛图》更为盛名。《五牛图》是唐朝韩滉创作的黄麻纸本设色画卷,又名《唐韩滉五牛图》,该作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五头牛中每一头牛既可独立成图,相互间又能首尾连贯,前呼后应,构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,整幅作品完全以牛为表现对象,无背景衬托,设色清淡古朴,浓淡渲染有别,画面层次丰富,达到了形神兼备之境界,不愧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神品。

《史记·天官书》谓:“正月旦,王者岁首,立春日,四时之始也”。怎样庆祝和迎接“四季之首”和“一岁之始”?传统农耕时代采取统治者“扶犁亲耕”等仪式,鼓励引导老百姓重视发展农业,而牛在一系列“迎春”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

史料记载,中国人对牛驯化的历史,可追溯到伏羲氏时代。依据甲骨文和金文的“犁”字“牛”旁的想像,古人很早就对牛进行役使,使其成为重要的耕战资源,并受法律严格保护。约作于公元前370年左右的《清华简·系年》称,“周天子”成为中国辽阔大地的统治者,象征之一便是“帝籍田”,而把“不籍千田”视为政权衰落的重要标志警示后人,以后的王朝建立者谁敢轻视。按《国语·周语》的说法,“帝籍田”并非指周礼系文献所说帝王春耕之类的“籍田礼”,它包括择日、戒斋、设坛、耕田、太宰等一系列大型节目,此项活动一般持续10天。而牛是“耕田”和“太宰”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。

西周初期创立“亲耕籍田”后,历代统治者遵行不替。从汉文帝“其开籍田,朕亲率耕”、唐太宗颁布“籍田诏”和恢复籍田仪式、宋仁宗“朕既躬耕,不必泥古,愿终田以劝天下”到清雍正帝即位伊始即行“亲耕礼”,“籍田礼”从未因朝代更替而消失。有趣的是,皇帝驱牛犁田虽为“表演”,但牵引木犁行进的耕牛却是不折不扣健壮“神牛”,围绕其表演的辅助节目、道具等随时代发展不断演变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上》曰:“立春之日,夜漏未尽五刻,京师百官皆衣青衣,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,立青幡,施土牛耕人于门外,以示兆民。”汉唐一脉,籍田仪式成了少数人演的“独角戏”,活动现场气氛严肃、观赏性差,使得整个“迎春”活动始终居庙堂之高、离百姓甚远。到了社会稳定、经济繁荣的宋代,官方、民间纷纷主办声势浩大的“迎春”活动,随着老百姓参与度、满意度大幅提高,其观赏性、娱乐性、趣味性和市场性很快融为一炉。立春当天,皇帝由一帮大臣陪着去“犁田”,而市面上出售人造“春牛”玩具的商铺生意也异常火爆。大家相互赠送为迎春特制小旗子和点彩的柳枝。

不过,宋人庄绰史料笔记《鸡肋编》卷上却说出“春牛”的另一种作用:“今世遂有造春牛毛色之法,以岁干色为头,支色为身,纳音色为腹。立春日干色为角耳尾,支色为胫,纳音色为蹄。至于笼头缰索与策人衣服之类,亦皆以岁日为别。州县官更执鞭击之,以示劝农之意。”老百姓也跟着去打碎春牛玩具,小孩子们一哄而上就去抢碎块。河东(今山西西南部和陕西葭县以北一带)认为泥捏的“春牛”“兼辟瘟疫”,一些人把抢到一点泥“春牛”的肉悬挂于床帐防疫,并“调水以饮小儿”。庄绰还说,为争抢泥“春牛”的肉,有人不惜大打出手,“竟致损伤者”。南宋诗人杨万里触景生情,还写下一首《观小儿戏打春牛》:“小儿著鞭鞭土牛,学翁打春先打头。黄牛黄蹄白双角,牧童缘囊笠青篛。”

泥捏的“春牛”肉被视为“疫苗”,用以防疫瘟,听起来虽很荒唐,却也可看作是科技落后、信息闭塞的古代,老百姓防疫意识的觉醒。

